

6 | 文摘

聚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命运：

从受辱被骗到不屈抗争

核心提示

●一战初期中国力图借参战之机靠近西方，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以避免列强的侵略，三次提出参战，前两次都因日本从中作梗而遭拒，最终虽如愿参战，但自身利益已被日本和协约国秘密勾结牺牲掉了。

●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被宰割，中国选择了抗争，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终于清醒。

●一战后爆发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人继辛亥革命对自己传统的封建专制说“不”后，又否定了西方道路。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寻找第三条道路，最后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中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将信任票投给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这艘巨船经历了自开天辟地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碰撞和变迁，也在动荡中找到了民族复兴的正确航向。

□李成刚

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这一年，对中国人而言无疑具有双重的酸楚滋味。

回望历史深处的1914年，新生的中华民国已历三载，但战乱、政争、贫困却仍在折磨着这片苦难的大地。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这片破碎的山河雪上加霜。

受辱的中立国——

大战爆发之初，中国希望以中立身份远离战火，但对德宣战的日本非但不派一兵一卒赴欧作战，反遣重兵占领中国山东，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普林西普射向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的子弹，点燃了巴尔干半岛这一欧洲火药桶；1个月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至8月初，欧洲已形成以德、奥等同盟国为一方，以英、法、俄等协约国为另一方的对战双方。

大战打响时战局复杂混沌，为了防止战火蔓延到中国，北京政府于8月6日发表中立宣言并公布24款“局外中立条款”。

但是，由于主要参战国英、法、俄、德、日等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加之自身实力弱小且内耗不断，中国的中立未能使自己幸免于难。

中国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借口英日同盟对德宣战。但是，日本非但未派一兵一卒赴欧作战，反倒盯上了中国山东。日本此举有着多重考虑。首先，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守军只有5000人，又远离本土，孤立无援，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同时，日本出兵山东可能得到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的默许甚至支持。再者，日本借德国深陷欧洲战场之机夺取山东，不仅可以报1895年德国伙同俄、法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的一箭之仇，还可拔除阻碍日本侵华的一颗钉子，从山东对中国实现中间突破，造成更为有利的侵华态势。

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8月23日前同意立即撤出停泊在日本海及中国海上的军舰，并于9月15日前将全部胶州租借地无条件地交付日本。

德国接到最后通牒后，由于无力在远东对抗日本的进攻，德国驻华使领馆代办马尔参向北京政府表示，如果中国以后给予补偿，德国可以立即将胶州“交还中国”。北京政府立即与德国展开非正式磋商。日本获悉后警告北京方面必须马上停止此项活动。不敢得罪日本的北京政府立即停止了与马尔参的谈判。

无奈的北京政府又提议将德国在胶州的权益先转让给美国，然后再由美国交还中国，但遭到美国拒绝。中国利用美国阻止日本出兵山东的计谋破灭。

8月23日，日本以未得到德国答复为由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在山东龙口等地登陆。袁世凯大总统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但陆军总长段祺瑞称中国军队只能抵抗日军48个小时。无计可施的袁世凯只能设法限制日军的行动范围以减少损失，划出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地为“战区”。

然而，日本完全无视中国政府划定的范围，攻占“战区”之外的潍县车站和济南车站，并完全控制了胶济铁路。对于日军掠夺中国人的财物、强奸当地妇女、肆意杀害中国人等罪行，一战后协约国方面对德国敢怒而不敢言，听之任之。刚刚以比利时的中立被破坏为由向德宣战的英国，对日本破坏中国中立的行为却支持态度，于9月23日派

900余名英军在崂山湾登陆，配合日军在10月底对青岛德军发起攻击。在此期间，青岛主权的所有者中国讽刺性地实施“局外中立”，复制了1902年至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时清政府的做法。11月7日，日军占领青岛。

占领青岛后，日军公然在山东各地架设军用通信线路，设立民政署，把整个山东划入由它独占的势力范围。1915年1月3日，北京政府宣布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回。日本不仅不予理睬，反而不顾外交惯例，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于1月18日径直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西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显然，日本企图趁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之际，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and 附庸。

尽管英、法都认为日本的“二十一条”有损本国在华利益，但为了获得日本的军事援助，均同意了日本的要求。肆无忌惮的日本，以最后通牒的形式于5月9日迫使袁世凯接受其要求。5月25日，中、日签订《关于山东之条约》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换文，总称《民四条约》或《中日新约》。通过该条约，日本获得了山东权益，同时扩大了日俄战争之后取得的满蒙权益。

被骗的参战国——

中国力图借参战之机靠近西方，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以避免列强的侵略，三次提出参战，前两次都因日本从中作梗而遭拒，最终虽如愿参战，但自身利益已被日本和协约国秘密勾结牺牲掉了

在一战参战国中，没有哪个国家的参战经历如中国般曲折。

中国第一次提出参战是在日本出兵山东之前。1914年8月底，得知英国准备配合日本夺取青岛后，为避免青岛落入日本之手，袁世凯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中国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英军一起收复青岛。但是，朱尔典甚至在没有与同为协约国的俄、法两国公使商谈的情况下就断然拒绝了中国的出兵提议。

中国第一次参战请求看似是遭英国拒绝，实则是日本从中作梗。由于担心中国参战后，早有亲英、美倾向的北京政府与英、美等国更加亲近，而不利于其扩大对华侵略，日本告诉北京政府，中国既宣布中立，就无对德作战之理。同时，日本又照会俄、英、法等国：没有日本的同意，关于中国参战问题不得形成任何协定。

此时的英国，既担心日本侵吞自己的在华利益，又想借助日本的军事力量清除德国在华势力。鉴于日本比中国强大且反对中国参战，英国最终选择拒绝中国。英、日经过交涉还达成协议：日本保证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英国则配合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

山东被日本占领后，中国政府为了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再次提出参战申请。1915年11月6日，中国通知英国，如果得到英、法、俄的邀请，中国将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国作战。此时的欧洲战场已经陷入僵局战僵局，中国参战对协约国不仅意味着宝贵的物资援助，而且意味着所有在华德侨以及德国企业

必须撤离中国，将极大削弱德国的力量，因此得到英、法、俄的欢迎，他们还力劝日本同意中国参战。

然而，日本又一次拒绝了中国的参战申请。对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1916年2月写给朋友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不愿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日本情愿希望欧战拖延得越久越好，这样才能确保中国陷于任其宰割的状态。”

到了1917年2月，日本对中国参战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由反对变为鼓动中国尽快参战。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甚至派遣亲信西原龟三赴华，以同意中国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高关税和提供参战军费为诱饵，唆使北京政府对德国宣战。

日本态度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其与英、法等协约国已经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日本以支持中国参战为条件，换取协约国主要国家在战后对其在华势力特别是在山东权益的认可。英国向日本保证，在战后和会上将支持日本在山东权益等方面的要求。日本与俄、法、意也达成了类似秘密协定。

日本的要求得到全部满足后，阻止中国参战便失去意义。相反，通过支持中国参战，日本还可得到更多好处：一方面，此时的美国正准备参战，也极力鼓动中国参战，日本鼓动中国参战，无异于顺水推舟，既不得罪美国，又能把促成中国参战的功记在自己头上，借此挽回先前因阻挠中国参战而造成 的外交被动局面；另一方面，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府的实权落在亲日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借着支持中国参战，日本可加强对中国的控制。

由于日本态度的转变，中国参战的外部阻力已不复存在，但中国政府内部此时却发生了“府院之争”。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不愿意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借参战捞取政治资本，由主张参战转为反对参战。“府院之争”的实质并不在于中国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导参战，以便从中捞到一笔西方列强的借款，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府院之争”延迟了中国的参战时间，又过了半年，到8月14日，中国才正式对德奥宣战，此时大战已经接近尾声。

对于中国参战，有些学者认为，从外部讲，是迫于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从内部讲，这是一场在各自西方主子支持之下军阀争权夺利的闹剧。然而，若从历史大视野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体会 到当时中国人对于通过参战使中国纳入西方社会、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并收回国家主权的强烈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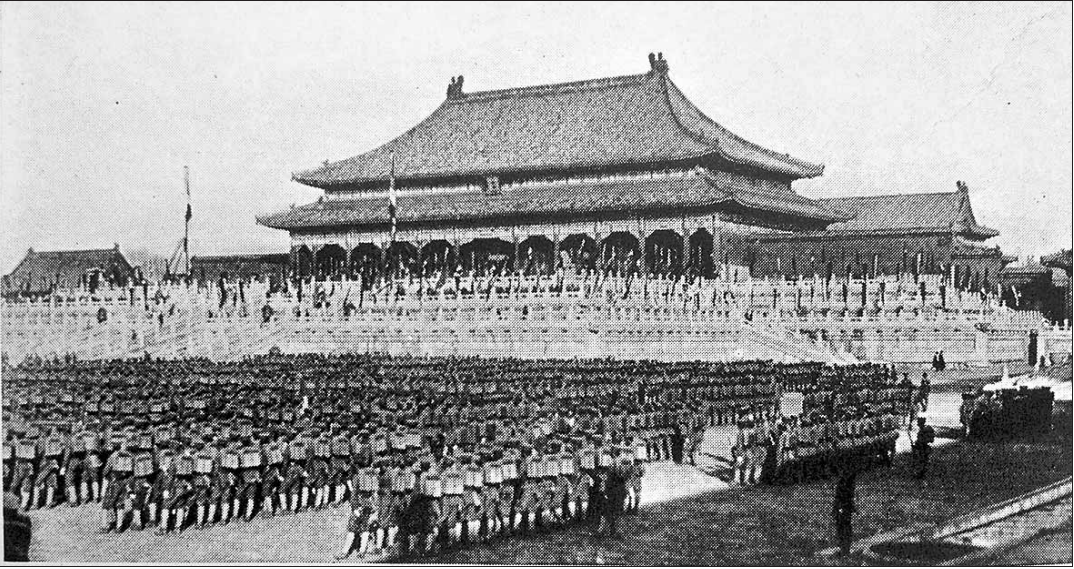
屢遭日本阻挠的中国终获参战权，但自身的利益早已被日本和协约国秘密勾结牺牲掉了，中国从一开始就被自己的“战友”出卖。中国的参战，无异于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

不屈的战胜国——

巴黎和会上战胜国被宰割，中国选择了抗争，输 了外交却赢得道义，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终于清醒

获得参战权后，为了争取在战后和会上的话语权，中国表示愿意派兵赴欧作战，但是仅得到法国同意。英国认为，即使中国最好的军队也不能“在西线的炮火面前坚持5分钟”。日本没有向欧洲派出一兵一卒，也不想让中国享此殊荣。

最终，中国没能直接派兵赴欧参战，但是为协约国一些国家送去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中国成为战胜国。图为北洋政府11月28日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阅兵，以示庆祝。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图为学生在演讲中。

大量粮食、枪炮，同时有约20万华工到欧洲和中东为协约国服务，其中约有2万人失去了生命。

1918年，一战以协约国获胜告终。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中国，此时尚不知道自己早已被出卖，对收回山东权益仍然抱着美好而天真的幻想。协约国获胜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政府以全国放假3天来庆祝。怀着对美、英、法等国的信任和对世界新秩序的憧憬，渴望能享受战胜国的权利并一举改变屈辱的历史，中国推选出最优秀的外交官组成强大的外交团队远赴巴黎，其中包括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等。

然而，和会一开始，西方列强就反参战前平等对待中国的承诺，以中国对协约国的贡献很小为由，只给予中国代表团2个代表名额，而英、美、法、意、日则各有5个代表席位。和会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意、日各派2名代表组成，称“十人会议”。

在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力争收回山东主权，为此与日本代表团展开了激烈交锋。日本代表牧野在1919年1月17日的“十人会议”上声称，胶州湾租借地、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所有权利应无条件让与日本，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其目的是阻止和会讨论山东问题。

中国代表团推举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充当对日斗争的先鋒。顾维钧生于江苏嘉定一富商家庭，留美博士，27岁就出任驻美公使，具有出众的外交才能。1月28日上午，顾维钧发言指出：山东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国人的一块圣地”，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直接归还山东；至于中国在战争期间与日本签署的那些条约，均受日本胁迫，属于不平等条约，理应废除。他还出示了大量证明材料和档案文献，其中有关于日本军队在山东所犯罪行的请愿书和诉状。美国国务卿兰辛后来写道，顾维钧的演讲很有说服力，其“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

但是，日本代表牧野是一个极其老练的对手。他立即公布了中国参战之前日本与英、法、俄、意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4月16日，五国开会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被排斥在外。

中国代表团深感问题棘手。一行人商议后，于4月20日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要求胶州湾由日、英、美、法、意五国共管，日后再交还中国，中国愿支付日本攻打德军的军费并在日后将胶州湾开为商埠。美国接受了这个方案。日本则坚决反对，并以拒绝参加国联相威胁。英、法、意三国代表因与日本事先订有

掌故

番茄——最早被称“狼桃” 无人敢食

相传番茄的老家在秘鲁和墨西哥，原先是一种生长在森林里的野生浆果。当地人把它当作有毒的果子，称之为“狼桃”，只用来观赏，无人敢食。当地传说“狼桃”有毒，吃了“狼桃”就会起疙瘡长瘤子。虽然它成熟时鲜红欲滴，红果配绿叶，十分美丽诱人。但正如色泽娇艳的蘑菇有剧毒一样，人们还是对它敬而远之，未曾有人敢吃上一口，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来对待。

据记载，十六世纪，英国有位名叫俄罗斯达拉的公爵在南美洲旅游，很喜欢番茄这种观赏植物，于是如获至宝一般将之带回英国，作为爱情的礼物献给了情人伊丽

莎白女王以表达爱意，从此，“爱情果”、“情人果”之名就广为流传下来。但人们把番茄种在庄园里并不吃，只是作为象征爱情的礼品赠送给爱人。

过了一代又一代，仍没有人敢吃番茄。到了十七世纪，有一位法国画家曾多次描绘番茄，面对番茄这样美丽可爱而“有毒”的浆果，实在抵挡不住它的诱惑，于是产生了亲口尝一尝它是什么味道的念头。他冒着生命危险吃了一个，觉得甜甜的、酸酸的、酸中又有点甜。然而，躺到床上等死的他居然没事，于是“番茄无毒可以吃”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发票——旧称“发奉” 民国时人情味十足

民国文脉在小小发票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账房先生往往把修自行车轮胎的发票都写成了一幅养眼的书法作品。那时候礼拜天去朝天宫、南艺后街淘，无意中发 现发票真是奇妙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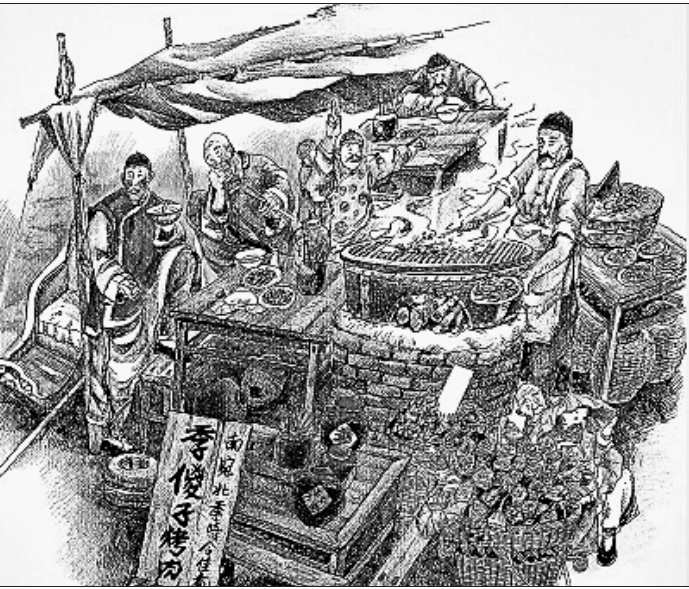
想知道民国时期的发票是什么样的吗？想了解民国时期首都南京的物价水平、商业分布吗？近日，观筑沙龙“发奉墨香——民国发票资料展”在位于南京升州路118号的美大纸行旧址开幕。民国范儿的南京连小小一张发票都颇具人文价值。展览将展出至本月19日。

修自行车也要发票

从这些发票的方寸之间来看，当时通货膨胀惊人，修个自行车、买个脸盆，动不动就要花上“数万元”巨款。比如“水泥两袋，法币八万元，农林部收讫”。落款是“中央畜牧实验所乳牛场”。还有南京鹤林鲜果庄发票，“大蜜桔十斤，.64万元”，付款方是“新安公司”，连用途“送礼”也写上；南京益大协记煤炭锅号支店发票上写着“广锅一口，计币一千零伍拾元”。修自行车也要发票呢，“承修自由车外胎两个，共计实收法币五万元，农林部棉产改进处”，并贴上一排印花税记。还有，脸盆四只，需要花费法币九千元。农林部在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购买生理食盐，花了240万元，发票用英文开具。

南京藏家王灏良告诉记者，近年来自己收集的发票有700余张，多是从1946年到1949年的，此次展出的只是其中100多张。那个年代的商家诚信度很高，自觉纳税，不论大小均开具发票。“看这些发票，我甚至觉得现在有些东西反而不及原来做事严谨，各种签字画押。所谓民国范儿，就是传承。”

烤肉——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食品



烤肉，是北京久负盛名的特色菜肴，至少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据说它是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食品，曾被称作“帐篷食品”。它也曾作为美味被摆上宫廷大宴。《明官史·饮食好尚》记载，凡遇寒冬雪飘，则暖室赏梅，以吃炙羊肉为快。“炙羊肉”，即烤羊肉。

最早的烤肉，是把牛肉或羊肉切成方块，用葱花、盐、鼓汁稍浸一会儿再行烤制。明末清初时，蒙古族人则是把大块的牛、羊肉略煮，再用牛粪煮熟。清代道光

年间，诗人杨静亭《都门杂咏》写道：“严冬烤肉味堪馨，大酒缸前围一遭。火炙最宜生嗜嫩，雪天争得醉烧刀。”位于宣武门内大街的烤肉宛和什刹海北岸的烤肉季，是北京最知名的两家烤肉店。两店一南一北，素有“南宛北季”之称。按照中医的理论，猪肉性微寒，有解热功能，补肾气虚弱；牛肉性温，可滋养脾胃、强健筋骨；羊肉性热，适于体虚胃寒的人食用。

（摘自《北京日报》）